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

数字时代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论丛

文献辨伪学研究

Research on Bibliotics

司马朝军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数字时代图书馆情报学研究论丛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

文献辨伪学研究

Research on Bibliotics

司马朝军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献辨伪学研究/司马朝军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 6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

数字时代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论丛

ISBN 978-7-307-06393-8

I. 文… II. 司… III. 文献—辨伪—文集 IV. G2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93310 号

责任编辑: 陶洪蕴 责任校对: 刘 欣 版式设计: 马 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wdp4@whu.edu.cn 网址: www.wdp.whu.edu.cn)

印刷: 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980 1/16 印张: 25.75 字数: 368 千字 插页: 2

版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06393-8/G · 1207 定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数字时代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论丛》

编 委 会

顾问 彭斐章(武汉大学资深教授,信息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
孟广均(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吴慰慈(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信息管理系博士研究生导师)
胡述兆(台湾大学图书资讯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梁战平(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倪 波(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黄长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学部委员)
冯惠玲(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

Raymond von Dran (Professor and Dean, School of Information
Studies, Syracuse University)

Harry Bruce (Professor and Dean, Information School,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主编 陈传夫 马费成 胡昌平

编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费成	方 卿	王新才	刘 荣	刘家真
朱玉媛	朱静雯	沈祥兴	肖希明	李 纲
吴 平	陈传夫	张玉峰	张李义	邱均平
何绍华	周 宁	罗紫初	胡昌平	查先进
曹 之	黄如花	黄先蓉	黄凯卿	董有明
董 慧	焦玉英	詹德优		

总序

“图书馆学情报学”是我国的习惯用法，是涵盖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出版发行学等学科的名称。在我国台湾被称为“图书馆与资讯科学”，英文为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美国也用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来称谓这一学科。

1807年，德国学者马丁·施莱廷格（Martin Schrettinger, 1772 ~ 1851年）首次使用了“图书馆学”这一概念，1808年他又在《试用图书馆学教科书大全》中建立了以图书馆整理为核心的学科体系，标志着图书馆学学科正式诞生。

自1887年美国学者杜威（Melvil Dewey, 1851 ~ 193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办世界第一所图书馆学校，1930年在卡内基基金的资助下芝加哥大学设立第一门图书馆学博士班课程以来，图书馆学开始走进大学殿堂，成为高等教育中的一个专业。

图书馆学教育在美国的兴起带动了全球图书馆教育的发展。1919年英国在伦敦大学建立了图书馆学院。目前，美国有56所美国图书馆学会（ALA）认可的图书馆学院，每年招收图书馆与情报学学生26 000人左右。

在施莱廷格后的两个世纪，图书馆学科不断变化。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冷战期间，美苏军备竞赛，两大阵营形成。苏联卫星上天，美国实施阿波罗计划，科技文献激增。科学家对文献信息的获取变得困难。一门新型学科——情报学应运而生。1963年美国文献工作学会正式更名为美国情报学会（ASIS）。大量增设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硕士点、博士点。图书馆学课程表中也增加了大

量的情报学课程。

20 世纪 70 年代, 计算机技术在图书馆与信息工作中广泛应用, 自动化、地区性图书馆网络形成, 机读目录广泛应用, 国际图联将世界书目控制列为核心计划。图书馆学 (Library Science) 发展为“图书馆与情报学”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后来又进一步演变为“图书馆与情报研究”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20 世纪 80 年代高新技术迅速发展, 信息时代到来。美国里根政府实施星球大战计划, 欧洲实施尤里卡计划等。联机图书馆系统广泛建立, 并扩展至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商业性联机数据库如 ORBIT, DIALOG 发展迅速, 图书馆与情报职业面临挑战。为适应信息时代要求, 国际上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开始调整。国际上有较多大学将图书馆学院易名为图书馆与情报学院或信息研究学院, 图书馆学、情报学在硕士、博士层次合二为一。

20 世纪 90 年代, 全球进入后信息时代——数字时代到来。克林顿政府开始实施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计划 (NII)、全球信息基础设施计划 (GII)。新一代互联网投入使用。欧美初步建成信息社会, 全球进入无缝信息环境。世贸组织建立和一揽子贸易协定生效, 使全球经济一体化并逐步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各国继续加强图书馆学、情报学学科调整。图书馆学、情报学学科内容向情报科学汇集。

进入 21 世纪以来, 国际上信息管理学科变化很快。自雪城 (SYRACUSE) 大学将学院更名为信息研究学院 (The School of Information Studies) 后, 在美国立即出现了 iSchool 的浪潮。伊利诺依斯大学、华盛顿大学、密歇根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北卡罗来那大学等知名大学的图书馆与情报学院宣称自己为 iSchool。这些 iSchools 通过宪章组成 I-Schools 联盟 (ISG)。目前共有 20 所美国的大学加入联盟 (联盟宪章不允许超过 25 个)。iSchool 强调信息、技术与人的关系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people)。iSchool 的标准包括: 必须有杰出的研究和杰出的博士教育; 必须能在科学、企业、教育与文化进

步过程中提供任何形式的信息所需的专门技术；必须能提供信息技术及其应用、信息使用与用户方面的专门知识。2004 ~ 2006 年的联盟领导委员会协调人是雪城大学信息研究学院的 Raymond von Dran 院长，2006 ~ 2007 年将由匹兹堡大学信息学院院长 Ron Larsen 担任。联盟成员的标准主要强调研究即实质性承担研究活动（三年中每年研究支出达到 100 万美元），同时，致力于培养未来的研究者（通常通过研究型的博士点），引领推动信息职业领域。

国际上图书馆与情报学科的发展表现出明显的特征：研究范围由传统的图书馆领域扩大到信息领域（information field），研究视野由实体的图书情报机构扩大到虚拟空间，研究对象由图书文献转向了信息内容。一系列相关学科如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出版科学、信息管理与系统乃至数字商务汇集于信息科学（Information Sciences）下，从而使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科起源于 1920 年美国学者韦棣华女士创办的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档案专业起源于 1940 年的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的档案管理科。1978 年武汉大学创办科技情报学专业，后改为情报学专业。1983 年创办图书发行学专业，2002 年创办电子商务专业。1984 年经教育部批准建立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2001 年更名为信息管理学院。图书馆学和情报学两个二级学科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国家重点学科。“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教育部批准“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为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信息产业部批准成立“国家信息资源管理（武汉）研究基地”。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建立“新闻出版总署武汉大学高级出版人才培养基地”。“网络信息资源开发与数字图书馆建设”被国家计委、教育部等批准为“十五”211 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建立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创新基地被列为国家“985 二期工程”建设项目。一批院内校级重点研究基地如武汉大学四库学研究所、武汉大学中国科技评价中心、武汉大学政府信息

研究中心、武汉大学数字图书馆研究所、武汉大学出版发行学研究所、武汉大学图书馆情报学国际合作研究中心也在科研和人才培养中发挥着重要平台作用。

强调一级学科内学科群建设和学科协调发展是武汉大学图书馆与情报学科建设的根本目标。以图书馆学、情报学两个国家重点学科为龙头促进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信息资源管理、出版发行学等学科的协调发展。

我们深刻认识到信息资源与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共同构成支撑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体系。信息资源是知识经济时代重要的国家战略资源，是实现经济和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对信息资源的拥有、开发和利用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之一。消弭信息鸿沟、实现信息公平，是消除贫困、促进经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之一。

信息资源管理人才培养是学院的基本任务。学院每年为国家培养本科生 260 名，硕士研究生 150 名，博士研究生 55 名左右。学院有一支知识结构和年龄结构合理的优秀学术队伍。这支队伍中有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1 人，博士研究生导师 26 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6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3 人，武汉大学珞珈特聘教授 2 人。作为实现研究型学院建设目标的一部分，在教学的同时，广大教师承担了大量的科学研究任务。为了推动本学科领域的前进，分享他们的见解，在武汉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并报有关部门批准，我们拟出版《数字时代图书馆情报学研究论丛》（简称《论丛》）。

为了编辑这套丛书，武汉大学邀请了国内外知名学者担任《论丛》的学术顾问，组建了主要由信息管理学院的博士研究生导师担任委员的编辑委员会。

《论丛》拟用 4 年时间出版著作共 20 卷。20 卷著作将分为三个系列：（1）学科年度进展。主要约请信息管理学院图书馆学系、档案与电子政务学系、信息管理科学系、现代出版系、信息系统与

档案与电子政务学系、信息管理科学系、现代出版系、信息系统与电子商务系的有关教师和校外专家共同编写本学科的年度研究进展,主要有《图书馆学研究进展》、《情报学研究进展》、《档案学研究进展》、《出版学研究进展》、《信息资源管理学研究进展》;(2)个人学术专著。涉及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基本理论研究、信息组织与检索、信息资源管理、信息资源建设与信息服务、文献编纂与出版、数字图书馆与信息系统工程等研究方向;(3)研究报告系列。我院研究人员共承担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招标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多项。特别是211项目和985项目,围绕数字信息资源开发与管理、数字信息资源服务与保障、信息资源公共获取与知识产权协调管理、数字图书馆关键技术与系统、资源与服务整合、信息构建与知识管理等主题正在进行探索。在信息构建的理论与方法、信息系统与资源整合、元数据知识表达、网络计量与参考、信息服务集成机制、信息资源与服务集成技术、媒体及数字出版、数字内容分销、信息资源的长期保存、商务信息流等关键领域力图实现图书馆学科在数字图书馆领域、情报学科在数字资源管理领域、档案学在数字化政务信息管理领域、出版发行学在数字出版与数字化分销、信息系统科学在集成系统以及数字化商务信息流研究方面取得研究成果。本系列将对部分研究结果进行报告。

丛书的出版是学院广大教师和研究人员辛勤探索的结果,在此,谨向严谨治学、辛勤耕耘的各位著作者表示感谢!对武汉大学出版社的支持表示感谢,对责任编辑严红女士在策划编辑过程中付出的艰辛劳动表示感谢。同时,还望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共同推动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出版发行学和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进步!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院长 陈传夫
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主任 马费成

2006年10月8日

程 序

吾友司马朝军博士，别号献堂，又号观衢轩主人，素有考据辨伪之癖，适哀集近年所为关乎辨伪之作成，期予曰：“序之。”其始也，予不敢诺其使。所以者何？大凡为人作序者，太上曰大家，其次曰通人，其次曰名人。于学无所不窥，博综赅洽；且自树一义，足可雄视千古，开示来学，此大家也。学无树义，不足以名家，然博闻强记，多识草木鸟兽虫鱼；且小叩而大鸣，循循然善诱，斯为通人。至若名人，则无论知与不知，识与不识，咸闻其名。夫大家者，作之者圣也；通人者，述之者明也；名人者，炙手可热也。故大家之序，述其学术源流，指其树义得失，有俾于世道人心者也。通人之序，程器指瑕，剔抉是非，亦于学问文章之道不无小补。名人之序，其为用则大矣哉！好恶臧否，不翅袞职斧钺。倩名人撰序以为揄扬，即使覆瓿盖酱之作，立生洛阳纸贵之效。倘若名人有所否责，亦不过如绍兴周氏之所谓“阿七打了阿八，打的有名，被打的也托庇出了名”，斯亦殊途而同归矣非邪？何况大有名之人，从来不与无名小辈为难，不仅有求必应，听然而笑曰：“诺！”继而搦翰构文，绝不忘却“善哉，某子之某作也”！

予既非大家，自无树义，固不能假序人之作以匡世。予亦非通人，腹笥甚俭，于疑古辨伪之学，尤不得其门径。先前有顾颉刚与钱玄同，远宗两宋而近祖康（有为）、崔（适），倡言疑古。晚近又有耆学硕士大扇“走出疑古时代”，前人所是者，一概而非之；前人所非者，又一概而是之。樊然淆乱，后进承学之士，恶能知其辨？惟其所以如此者，大抵或激于时流，或诱于势利，不免各有所偏而不得其平，予终不敢苟信焉。是以予于观衢之大著，不能置一辞，遑论序之云尔！且予又非名人，并无袞职斧钺之效，于观衢不

能增其光彩，垒其声名。更何况观衡之四库学，自辟径遂，无需假手他人以树声。是予之不欲承命也，不亦宜乎！

然则予之自违其衷而慨然许之者，亦有私焉。予于观衡远或为同姓，近亦为挚友。太史公曰：“昔在颍项，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既为程伯休甫之后，则予与观衡在周为同姓，有太史公之文为证，当无所疑焉。惜乎予之疏于考据，尤不善谱牒之学，未能确知观衡之行辈。否则，倘若细为排比，予长观衡三辈，抑或观衡长予三辈，皆未可知。国人之于传统，情有独钟者，莫过于宗族与谱牒，予亦自不能免俗。鄙谚不亦云乎：“打虎还须亲兄弟，上阵犹靠父子兵！”予既与观衡在周为同姓，又蒙观衡之不弃，则作序之事岂可推而诿之！

是亦近之矣，然犹有感焉。近有某“工程”者，鸠集群儒，虚费府帑，倾动朝野，名震一时。然海内外诸君子尚有异同不逮之论，甚且微词而后喷有烦言。是上古三代，茫昧无稽，岂虚言哉！乃太史公以一人之力，上起轩辕黄帝，下迄武帝太初，为《太史公书》，年代既绵渺，头绪既纷繁，其所叙之事，岂容尽实？且太史公叙其家世，自云重黎之后，与程伯休甫同宗，焉知非太史公高远其所从来，特以示司马氏司天之职由来古久？倘若如此，则予之与观衡是否同姓，何可质而正之？是惑矣，是亦在未定之数矣！且处数千载之下，欲尚考古事，岂其易邪？纵使尽殚国库之银，穷竭国人之智，人人穷经，举国掘地，未必能获片石只字以为证！观衡既以考辨见长，古迹尚在，犹可考之，辨之。倘若无迹可求，白茫茫一片，汝何从而考之，又何从而辨之？惟徒唤奈何而已。否则，非愚即诬也！

休乎已矣，弊弊焉劳神明于琐琐也！司马氏果为程伯休甫之后，予之与观衡为友者，则宿昔之好也；司马氏果不为程伯休甫之后，予之与观衡为友者，则新交之贤也。是予之与观衡同姓与否，无害于相友也。古人曰：“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须友以成者。”又曰：“（故）旧则不可更释，新交则非贤不友。”哲学系教授吴根

友博士，中文系教授杨逢彬博士，历史系教授杨华博士，心理学系教授师领先生，斯四子者，予之珞珈故旧也。哲学系教授丁四新博士，图书馆学系教授司马朝军博士，予之珞珈新交也。斯六子者，皆好学深思，奋发有为之士，亦珞珈人文之后继薪火也。而观衢之渊雅博识，学有本原，予尤企而慕之，且相知犹恨其晚也。然亦有足乐者存焉。司马兄之观衢轩与予之颜乐斋不百步之遥，而梦园沽肆亦予与观衢常顾之地。于“珞珈七子”例会之余，相邀而对饮者，以观衢为繁数也。其于临风把盏之际，或与熙嘻以论古，或同怒骂而消今。且时亦徜徉于湖山幽径，共听鸟噪蝉鸣而悦耳，相看花谢红飞以娱目。其取友论学之乐，往返留连之胜，非吾道中之人，岂可尽知邪！

穀梁子曰：“就师学问无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誉不闻，友之罪也。”予既非大家通人，于观衢之学不能窥其崖略；予亦非闻人，于观衢之名，尤不能增其分寸。是予之为友人友也，其于古人之训，徒能守其文而不克行其义也。是予之于观衢，有愧焉尔！予之于珞珈诸子者，亦有愧焉尔！

然则与人相友，固当以气类相推轂，尤须以道义相切磋，是友之义也。且序之有体，亦当毋违。是以无论于友之义，抑或于序之体，其于观衢之文，又不能无言也。是以予既三复其文，又屡案其义，知观衢于辨伪之学，独有会心也。尤其表彰明儒方以智“理”、“事”、“文”、“气”、“时”、“变”之辨伪六法，断断乎其为行家知言之论也。然则愚意以为，疑古辨伪之学，方法固不可轻忽，乃辨者之心术，尤为要中之要也！无论辨伪辨真，其言公与不公，决之于其心正与不正，而所谓“胡八条”抑或“方六条”（见本书《明代辨伪四大家合论》），皆不与焉。纵观吾国辨伪之史，其言公与不公，其心正与不正，于得失之际，间不容发！

由是而论之，“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辕固生之与公孙子，其人其时则云往矣，其言其事则有存焉，犹足以为后世之法戒而提命来学也。予与观衢存身于贞下启元之世，又不当以斯言共勉邪？是为序。

公元二〇〇五年九月廿八日程水金草于武昌珞珈山麓颜乐斋

自序

孙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轻地，有争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圯地，有围地，有死地。诸侯自战其地者为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为轻地，我得则利、彼得亦利者为争地，我可以往、彼可以来者为交地，诸侯之地三属、先至而得天下之众者为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为重地，山林险阻沮泽、凡难行之道者为圯地，所由入者隘、所从归者迂、彼寡可以击吾之众者为围地，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者为死地。是故散地则无战，轻地则无止，争地则无攻，交地则无绝，衢地则合交，重地则掠，圯地则行，围地则谋，死地则战。”（《孙子兵法·九地篇》）治学如治兵。选择研究方向，寻找研究课题，应该主动放弃“散地”、“轻地”、“争地”、“交地”，直奔“衢地”、“重地”、“圯地”、“围地”、“死地”。无论四库学之研究，抑或辨伪学之探讨，前辈学者固已拥簪前驱，导夫先路。然前修未密，亟待后出转精。吾侪犹须步武前贤，扎硬寨，打死仗，在学术研究之复杂地带——“衢地”、“重地”、“圯地”、“围地”、“死地”——寻找突破口，破釜沉舟，置之死地而后生焉。

年届不惑，殊感困惑。回首往事，恍若前尘。今不揣浅陋，模拟古人，聊作《自赞》一首，以激扬吾之志气。赞曰：

眸不炯炯兮貌不堂堂，弱冠之年兮负笈武昌。
屈贾之地兮等闲官场，青春蹉跎兮鬓发早苍。
而立之年兮毅然北上，朝乾夕惕兮发为文章。
三百万言兮覆瓿盖酱，东奔西走兮我马玄黄。
落伽之巅兮陟彼高冈，东海之滨兮咏歌沧浪。

濯纓濯足兮括囊履霜，天地悠悠兮宇宙洪荒。

是为序。时值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公元 2005 年 9 月 3

前言

传统文献辨伪学取得了大量实绩，同时，文献辨伪无论在方法上还是在结论上都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失误，值得我们进行认真反思。文献辨伪学的进展，既需要新材料的支撑，更需要对旧方法进行全面而深刻的反省。本书即是拷问传统文献辨伪学在态度、方法及结论等方面所作的一点有益的尝试。

这是一部关于文献辨伪学的专著。全书共 12 章，分为上、下、外三编。

上编为源流编，共 5 章，该编从纵向对于自西汉至清末民初二千年间辨伪学史上的代表性人物与专著提出了若干不成熟的看法；下编为专题编，共 6 章，从横向对六种涉及真伪之争的文献进行了深入探讨；外编为书目编，仅 1 章，即文献辨伪学的专科目录。

下面，分别做一简明扼要的介绍：

第一章《明代以前辨伪学述论》是关于西汉至宋、元的辨伪成就的札记。文献辨伪滥觞于两汉，发展于魏晋南北朝隋唐，至宋代形成一个高峰期，元代又有所回落，在明代则瓜熟蒂落，成为一门专家之学。有人竭力否认明代以前有辨伪学的存在。本章发掘出明代以前若干鲜为人知的辨伪史料，并以此为根据，提出了商榷意见。既是对“明代以前无辨伪学”论调的纠偏，也对目前几种辨伪学史作了补遗。

第二章《明代辨伪四大家合论》对于以宋濂、杨慎、胡应麟、方以智为代表的明代辨伪成就与方法作了重新估价。宋濂《诸子辨》为辨伪学史上第一部专著，第一次提示了作伪的两种类型。杨慎既是作伪老手，也是辨伪高手。胡应麟《四部正讹》是第一部全面总结辨伪学理论的专著，系统分析伪书产生的原因，系统总

结辨伪方法。明末方以智提出的从“理”、“事”、“文”、“气”、“时”、“变”六个方面辨伪的方法，代表了中国古代辨伪学方法论的最高水准。“胡八条”长期被视为金科玉律，对后世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而“方六条”反而被人遗忘。

第三章《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评析》重新审视了姚氏在辨伪学史上的贡献。

第四章《〈四库全书总目〉辨伪方法释例》已在博士论文中得到了初步反映，收入本书时又作了一点修订。《四库全书总目》是辨伪学史上的一座高峰，历来学界对此认识不足，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辨伪之风至乾嘉时代已经熄灭。本章将《四库全书总目》的辨伪方法归纳为8类32条，即文本（包括风格、文体、音韵、词源、方言、文词、称谓）、作者（包括碑传、游迹、生平、思想、水平）、著录（包括源流、卷数）、比勘（包括对勘、引文、因袭）、佚文（包括称引、辑佚）、编例（包括撰书义例、注疏义例、凡例、体例、编例）、名物制度（包括礼制、官制、历法、地理、避讳）、情理及其他（包括情理、史实、综合）。

第五章《梁启超辨伪“公例”质疑》对“十二公例”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辨析。梁启超的辨伪“公例”长期被奉为辨伪的金科玉律。随着大量简帛文献的出土，梁启超的辨伪方法论日益受到严重挑战。本章从逻辑的角度，结合出土文献，对梁氏辨伪“公例”逐一进行了辨析，发现所谓“公例”漏洞百出，武断至极，是简单化、片面化的产物，根本不是什么“科学的辨伪学理论体系”。

第六章《〈经义考〉辨伪一例》是近年发表的一则考订笔记，纠正了《经义考》一书的一个错误。即朱彝尊《经义考》卷一百三十三“吴氏澄仪礼逸经”条所引“又曰”一段文章不是出自何乔新之手，而是程敏政所撰。

第七章《〈经解入门〉真伪考》从《经解入门》的版本来历不明、阮序不足为凭、多记江氏身后人事、多与江氏歿后著述雷同、与《国朝汉学师承记》多相矛盾、与《经解入门》条例不尽相同、卷八附选之文皆伪、徐跋亦多不实之词等方面证明该书是一部伪书。原文写于1999年春天，是我的第一篇辨伪学论文，现在

又作了较大幅度的增补。目前，已扩大为一部专书辨伪著作——《〈经解入门〉疏证》，不久即可杀青。

第八章《〈读升庵集〉真伪考》为一桩长达200年的冤案平反。《四库全书总目》从义例、思想、文笔三方面断定《读升庵集》不是李贽编辑。二百年来无人对此提出异议，而是作为权威结论反复加以引用。本章以大量无可争辩的文献资料证明，以上结论是完全错误的。该书直接选自《升庵集》，其评语精华已选入李贽《焚书》《李温陵集》。《读升庵集》之序不伪，确出李贽之手。这桩长达二百年的冤案必须推翻。《总目》的辨伪态度不端正，先人为主。其辨伪方法也颇有漏洞，逻辑上不严密，推论上多臆测。《总目》在此个案上的失误，反映出传统辨伪方法的严重局限性。

第九章《〈野处类稿〉真伪考》在前人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考证，论证四库本《野处类稿》为一典型的版本作伪。《野处类稿》一书被收入《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将其作者定为宋洪迈。本章通过比勘四库本《野处类稿》与朱松《韦斋集》，发现《野处类稿》并非伪书，而是典型的版本作伪。

第十章《〈黄陵庙记〉真伪考》是最近与著名诗人流沙河先生进行商榷的一篇小文章，从著录较晚、未见称引、风格不类、称呼不当、版本不同五个方面论证《黄陵庙记》一文可能是南宋至明初之间文士所为，实非诸葛亮之手笔。“乱石排空，惊涛拍岸”一语，不是东坡剽诸葛，而是后人袭用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乱石穿空，惊涛拍岸”之句。

第十一章《〈伪书通考〉史源考》一文通过细致梳理，详细考察《伪书通考》的史料来源。近人张心澂的《伪书通考》一书号称“集古今辨伪之大成”，其实该书最主要的资料来源就是《四库全书总目》。该书引用《四库全书总目》时未能严格遵守学术规范，给中外学术界造成极大之错觉。通过细致考察，《伪书通考》还存在其他三大缺失：材料与方法严重脱节；该书核心概念模糊不清；大量征引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

第十二章《文献辨伪学论著目录》是我近年来编制的一份专题书目，原本为个人搜集研究资料之用，现在公诸同好，或许可以